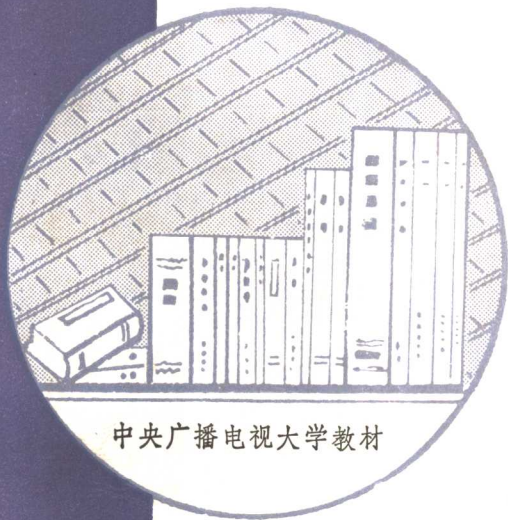


# 档案文献编纂学

曹喜琛 刘耿生 编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档案出版社

# 档案文献编纂学

曹喜琛 刘耿生 编著

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责任编辑：华 丹

档案文献编纂学

曹喜琛 刘耿生 编著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30千字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统一书号：7283·069 定价：2.15元

ISBN7-80019-001-3

G·0002

## 说 明

本书是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档案学专业教学编写的教材。其中第一——三、六——十一章由曹喜琛执笔，第四、五、十二——十四章由刘耿生执笔。

编写过程中参考并利用了《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中的某些观点和材料，参考并吸收了有关方面专家张舜徽、罗尔纲、严中平、吴枫、胡思庸、荣孟源等同志著述中的一些成果，也参考和借鉴了档案界，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的局限，加之应教学之急需，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

# 目 录

<b>第一章 总论</b> .....	( 1 )
<b>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b> .....	( 1 )
<b>第二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发展述略</b> .....	( 7 )
<b>第二章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总述</b> .....	( 35 )
<b>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意义</b> .....	( 35 )
<b>第二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和基本原则</b> .....	( 62 )
<b>第三章 编纂选题与编前研究</b> .....	( 69 )
<b>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题目的选定</b> .....	( 69 )
<b>第二节 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形式和读者</b> .....	( 84 )
<b>第三节 编前研究</b> .....	( 88 )
<b>第四章 档案史料的查找</b> .....	( 94 )
<b>第一节 查找档案史料的意义</b> .....	( 94 )
<b>第二节 查找档案史料的原则</b> .....	( 100 )
<b>第三节 查找档案史料的方法</b> .....	( 104 )
<b>第五章 档案史料的挑选</b> .....	( 128 )
<b>第一节 选材的意义</b> .....	( 128 )
<b>第二节 选材的原则</b> .....	( 131 )
<b>第三节 选材的基本要求</b> .....	( 147 )
<b>第四节 选材的方法与步骤</b> .....	( 191 )
<b>第六章 档案史料的考订和选本</b> .....	( 194 )
<b>第一节 考据历史述要</b> .....	( 194 )

第二节	考订档案史料的方法	( 202 )
第三节	档案史料的选本	( 220 )
<b>第七章</b>	<b>档案史料的加工</b>	( 231 )
第一节	档案史料加工的目的和原则	( 231 )
第二节	档案史料加工的方面与方法	( 234 )
<b>第八章</b>	<b>档案史料的标题</b>	( 256 )
第一节	单份档案史料标题的结构和标法	( 256 )
第二节	档案史料的组合标题	( 265 )
第三节	档案史料原有标题的处理	( 268 )
第四节	拟制档案史料标题的基本要求	( 269 )
<b>第九章</b>	<b>汇编内档案史料的编排</b>	( 275 )
第一节	汇编的体例	( 275 )
第二节	档案史料的分类排列	( 290 )
<b>第十章</b>	<b>汇编评述性材料的编写</b>	( 298 )
第一节	注释	( 298 )
第二节	按语	( 333 )
<b>第十一章</b>	<b>汇编查考性材料的编制</b>	( 341 )
第一节	年表	( 341 )
第二节	插图	( 351 )
第三节	备考	( 355 )
<b>第十二章</b>	<b>汇编检索性材料的编制</b>	( 360 )
第一节	目录	( 360 )
第二节	索引	( 369 )
<b>第十三章</b>	<b>汇编序言和编辑说明的撰写</b>	( 392 )
第一节	序言	( 392 )
第二节	编辑说明	( 416 )
<b>第十四章</b>	<b>汇编的出版工作</b>	( 428 )

第一节	底稿审核	( 428 )
第二节	装帧设计	( 433 )
第三节	校样校对	( 454 )

# 第一章 总 论

## 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 对象、任务和方法

### 一、档案文献

档案文献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客体，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必须弄清楚档案文献这个概念；而档案文献又是整个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首先要明了什么是文献。据古今学者考查，在我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文献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sup>①</sup>孔子在这里采用了文献这一概念，其中也包含着他对文献作用的认识，即缺乏文献不足以证实历史。在我国典籍中，较早解释文献的含义的要推宋代学者朱熹，他在为《论语》作的注解中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按：贤，指贤人、贤材，有人引申为熟悉掌故的人所讲的话，发表的议论，记录下来，称为献。）此后，元人马端临在其编纂的《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一番叙述，基本上沿用了朱熹的解释，并有所发挥，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存

---

<sup>①</sup> 见《论语·八佾》。



之，乖疑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失，证史传之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显然，他把书面记载称为文，把学士名流的议论称为献，即所谓“叙事为文，论事为献”。从《文献通考》的编纂形式也可以证实马端临对文和献是严格区别的：凡叙某事，顶格书写的，都是书本记载；凡论某事，则低一格书写，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直至清代，大体仍沿用宋、元学者的上述看法，大同小异。如清人杨宾在其《柳边纪略》自序中写道：“中原土地之入郡县者，山川方域，物产风俗，皆有文以书之，书而不能尽，与所不及书者，则徵之逸民逸老，所谓献也。”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古人认为：第一，文和献是有不同含义的，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面记录，献则是后人对历史上某事所发的议论、追忆的记录。第二，文和献的共同点是同为文字材料，都有印证史实的作用。

时至今日，对文献这个概念，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定义。但是，可以看到人们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出發，对文献作出的各种解释。例如情报学强调文献是“知识的结晶，情报的主要来源”；图书馆学则称文献为“一切知识的载体”；从资料工作的角度，它又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至于谈到文献的具体范围，更是众说纷纭：有人从材料的重要程度出发，认为凡重要者可视为文献，非重要者不得冒文献之名；有人从材料的性质出发，认为凡正面材料可归文献之列，反面材料不得列入文献之林；有人则把文献的范围推及得更广，认为它应当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迹、古物等实物史料。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给文献这个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只能根据我们的理解提出一些基本的认识。张舜徽说：

“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缙帛上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所区别的。”<sup>①</sup>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即对于一个概念，不能离开它原有的含义而作随心所欲的解释。

我们知道，每一个科学概念都是从现实本身概括出来的。然而，既然自然界、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互相联系的、变动的、彼此转化的，那么概念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自然也应当是灵活的、变动的，才能成为现实的正确反映。只有辩证地看待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才能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的定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间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文献也不断地发展、增新，旧有文献的含义已难以概括复杂万端的文献客体，因此，我们应当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探求文献的科学定义。

我们认为，文献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文

---

<sup>①</sup> 《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一九八二年版，第3-4页。

字、声音、形象的记录。这句话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其一，文献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说明了文献的来源和性质。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的影响，因而文献（除记述自然和科技现象的以外）就其内容来说，大都是有阶级性的，这是文献的第一个特性，也是我们对文献的第一个基本认识。

其二，文献是有价值的材料。这是对文献范围的限定。所谓价值，即不以材料的重要程度、正面与反面材料等情况为转移，只要具有某种价值（尽管价值有大小之分），均可称为文献。因为重要与否是相对的，以此作为划分文献的界限必然失去客观准绳；无论是正面文件，还是反面文件，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反面文件不算文献，那么历史上形成于统治阶级之手的大量的文献，势必排除于文献范围之外，这就等于说历史上几乎无文献可查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进而论之，文献的价值也不受材料的真、伪，内容的正、误等所左右。材料的真与伪，内容的正确与错误，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文献的凭证与查考价值恰恰在于文献本身具有的这种客观性。例如，《李秀成自述》，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曾国藩伪造或篡改的，尚无定论。但是《自述》作为客观存在，无论是真还是伪，均有其特定的价值。是真的，对研究太平天国史和李秀成的经历都有价值；是伪品，对于证明曾国藩的伪造和篡改具有研究价值。又如，真实的国民经济统计文献可以证明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夸大或歪曲的统计文献，可以证明浮夸和不正之风的事实存在，均不失为有价值的材料。这是文献的第二个特

性，也是我们对它的第二个基本认识。

其三，是说文献的外在形式。文献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是意识的记录，这种记录必须附着在一定的物质上面，图书情报学领域称之为载体。也就是说，文献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文献的直接载体是指记录人类认识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如文字、图形以及现代化的声波、电波等；间接载体是承载和传递符号的客体，如骨（甲骨）、石（石刻）、铜（铭文）、竹（竹简）、木（木牍）、树皮、羊皮、织物（缣帛）、纸张以及现代的化学材料（胶卷、胶片）、磁性材料（计算机的储存单元、磁带、磁盘）等等。概括地说，即文字的、声音的、形象的记录。不同时代的载体具有不同特征，对于鉴别文献的真伪，研究不同载体的文献在正文转达上的特点等，具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文献的第三个特性，也是我们对它的第三个基本认识。

以上三层含义基本上包含了文献的特征和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点，便可能导致对文献完整概念的误解。

文献的种类繁多，文件、档案、图书、报刊、家乘、谱牒等文字记录和照片、影片、录音、录象等声象记录均属之，唯古代不带有文字记录的器物、遗址等实物史料不包括在内。

档案既属于文献之一种，就具有上述的文献所共有的特性。但它也具有不同于其它文献的个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它具有原始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第二，它具有权威性，与其它文献比较，它具有或曾经具有法律效力，在一事有不同记载的情况下，一般以档案的记载为准，它的凭证作用较其它文献更为可靠。

档案文献编纂学着重研究档案这种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同时不可避免地应用一般文献编纂的原理和原则，在编纂实践中，这些编纂原理和原则也往往是档案与其它文献并用的，因此，我们这里使用档案文献这个概念具有双关的意义。

##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一门科学科目，它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档案文献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依据和条件，但是，档案文献的客观状况同人们利用要求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因而解决档案史料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同人们利用要求的专题性、科学性和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探讨解决这种矛盾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学问，便构成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编纂题目的选定，档案文献的查找、选择、考订和选本，档案文献的加工、标点、标题和编排，档案文献的评述性材料——注释、按语、序言的编写，档案文献查考性材料——年表、插图、备考、凡例的编制，档案文献检索性材料——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文献出版物的校对和技术设计。有关上述内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便组成本门学科的科学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总结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现实经验和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揭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规律，确立和不断完善它的理论和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档案文献的利用需求，是本门学科的根本任务。

具有中国特点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依其性质应遵

循下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档案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的属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项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的资料工作，这就决定研究本门学科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它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观点分析并评述档案史料的价值和公布史料的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和阐述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决编纂工作中各项理论的、实际的问题。

第二，它属于应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是本门学科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在着重研究和总结中国现实的特别是各级档案馆（室）的编纂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档案馆（室）以外有关部门的编纂工作经验，还应当注意批判地吸取外国的有益的经验。在研究中不但要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也要注意深入探讨具体的技术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第三，它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借鉴历史学特别是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史学研究的动态和情报，对本门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吸取文献学、目录学、情报学、考据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文书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是丰富和发展本门学科的必要条件。

## 第二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发展述略

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孔子

编订《六经》算起，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代相因、连绵不断，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历史上的文献编纂活动及其积累的成果，凝聚着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丰富的思想素材。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尚未发现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著述，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形成，但是，确有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在他们从事文献整理编纂和历史研究中，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探讨。我们目前对这一领域尚在初步探索中，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仅略述其梗概，以见一斑。

### 一、孔子编订《六经》及其编纂思想

在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是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其中《尚书》是第一部典型的档案史料汇编。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少时曾作过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牧场饲养员），五十一岁为鲁定公的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大司寇，五十六岁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是时，孔子以周公自命，反对社会改革，企图恢复日益没落的奴隶制。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然而到处碰壁。所谓：“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sup>①</sup>由于他的主张不能见于诸侯，遂自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sup>②</sup>在无可奈何之际，转而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以“追记三代之礼”<sup>③</sup>，并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以所编《六经》为教本，传播其思想、主张，以达其“拨乱世反之正”<sup>④</sup>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一目的不可能实现，然而孔子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普及了教育，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另一方面整理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使之流传下来。孔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文献整理编纂家，他在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上占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六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当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⑤</sup>又说：“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而无所作。”<sup>⑥</sup>更进一步明确说：“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sup>⑦</sup>龚自珍也说过：“六经者，国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sup>⑧</sup>可见，《六经》是孔子对“先王之陈迹”加以整

①②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史记·孔子世家》。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⑥ 章学诚《校讎通义·汉志六艺》。

⑦ 《校讎通义·原道第一》。

⑧ 《古史钩沉论》。



理编纂而成的“比次之书”，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史料书”、“史料汇集”之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们“非孔氏之书”、“非孔子所作”，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恰当的。

孔子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史料编纂工作，而不是史书的撰写工作。具体地说，《易》是讲卜筮的，其中有一些哲学思想，属于哲学史料；《诗》是春秋以前平民与贵族的诗歌汇集，不仅是文学史料，也是研究殷、周社会极有价值的史料；《书》是档案文献丛编，其中保存了虞、夏、商、周几个时代的档案史料；《礼》是古代典章制度的汇集；《春秋》是据鲁史取材编纂的大事记。总之，基本上属于史料汇编的性质，是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的稀有的文字史料，它们得以流传至今，孔子的编纂和历代辗转校订翻刻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关于孔子编订《六经》所遵循的原则，范文澜同志曾提出过较为系统的看法，笔者结合个人的体会臚列以下四点：

第一，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这是孔子编纂历史文献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sup>①</sup>他编订《六经》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故国文献，“先王之陈迹”。《诗》、《书》、《礼》、《易》，大都是档案文献的汇编，《春秋》虽属编述性的作品，但基本上是依时序排比史实，属于大事记的性质，都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字。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即是说，他认为把事实照录下来，要比自己空发议论深切明白得多。正因为如此，《六经》才被看成是研究历史的可靠史料。孔子倡导的这一编纂史料的思想，为我国历史档案文

---

① 《论语·述而》。